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赵树理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赵树理（一九〇六一—一九七〇）山西省沁水县人，享有盛誉的人民作家，「山药蛋派」的创始人。历任工人出版社社长，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山西省沁水县委、晋城县委副书记等职。◎他直接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成功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问题，并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和鲜明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赵州理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编
傅惠成 撰写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树理传/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8 (2009.9 再版)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ISBN 978-7-80170-499-3

I. 赵… II. 山… III. 赵树理 (1906~1970)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4063 号

本书图片绝大部分为本书编写组提供, 新版增加了部分图片, 因时间仓促, 不能完全确定摄影者姓名, 故未署名, 特向摄影者致歉; 并请相应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 与当代中国出版社总编室联系, 以便我们再版时准确署名及支付稿酬。联系电话: 010—66572131

出 版 人 周五一
主 编 李茂盛 卢海明
撰 写 傅惠成
责任编辑 陈德仁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印张 插图 160 幅 18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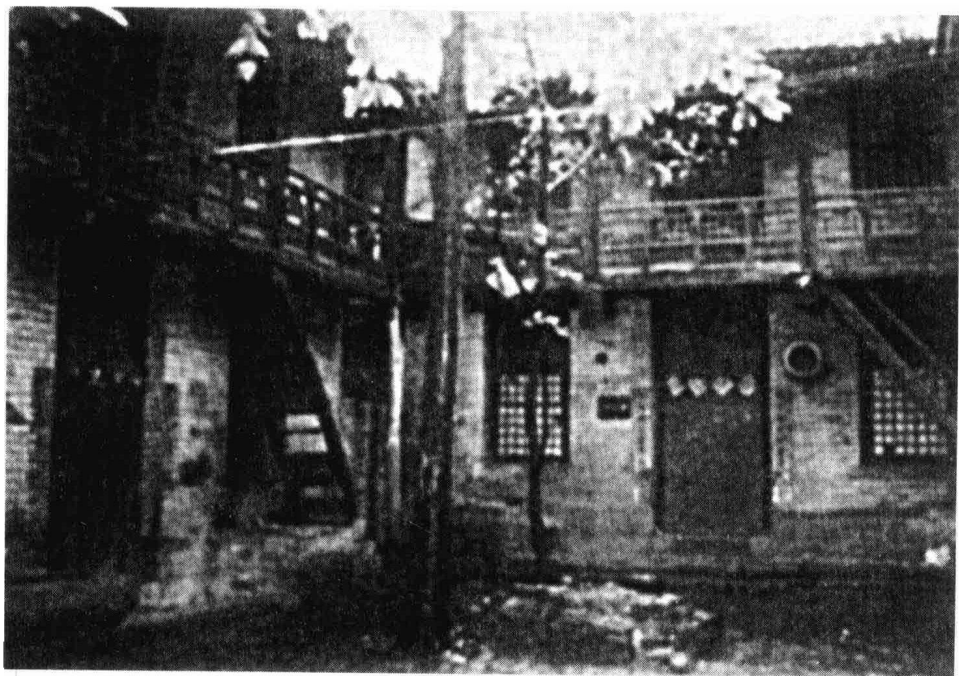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山村农家子	1
	一、穷困的童年	1
	二、崇拜“江神童”	5
	三、参加共产党	8
	四、初登讲台	12
第二章	萍踪异乡客	17
	一、重新执教	17
	二、辗转晋豫	22
	三、《打倒汉奸》	27
第三章	脱颖《万象楼》	32
	一、四区区长	32
	二、《韩玉娘》和《邺宫图》	36
	三、杂家办报	38
	四、《万象楼》	45
第四章	巨星耀太行	53
	一、传世之作《小二黑结婚》	53
	二、登上创作高峰——《李有才板话》	62
	三、史诗般的《李家庄的变迁》	72
第五章	“文摊”苦求索	83
	一、《福贵》	83
	二、赵树理方向	87
	三、《邪不压正》	96

第六章 “打入天桥去”	108
一、主编《说说唱唱》	108
二、《登记》	116
三、发现陈登科	123
四、谴责侵略者	126
第七章 情系《三里湾》	131
一、重回太行山	131
二、往返于城乡之间	135
三、《三里湾》	143
四、“问题小说”	160
第八章 评书《灵泉洞》	167
一、《开渠》	167
二、改编《三关排宴》	173
三、与曲艺的不解之缘	177
四、《灵泉洞》（上部）	184
第九章 正气留人间	195
一、抵制浮夸风	195
二、《锻炼锻炼》和《老定额》	205
三、倡扬实干精神	215
第十章 遭厄《十里店》	219
一、《三关排宴》的再改编	219
二、文艺标兵	223
三、《互作鉴定》和《卖烟叶》	226
四、《十里店》的风波	234
第十一章 岁寒知松柏	247
一、创作《焦裕禄》	247
二、山雨欲来	250
三、“三类半”干部	252
四、沁水呜咽	258
结 语	266
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者	266

第一章 山村农家子

一、穷困的童年

沁河，古称少水，发源于山西省沁源县西北 50 公里的二郎神沟，自太行山与太岳山的相连处，由北向南蜿蜒而下，流经沁源、安泽，进入沁水县。沁水县为晋豫交通要道之一，据清嘉庆年间修纂的县志载：“沁水境内延袤六百里，地旷人稀，幽岩邃谷，人迹所不到者，命盗案固所不免，又况南接阳城，入豫之孔道也；西邻翼城，则河东六郡所必经。而兹邑介乎其间，使节往来，几无虚日，自元年用兵川楚，而役行尤多……”沁水县在汉代名端氏县，后魏孝明帝于此置泰



■ 沁水县尉迟村赵树理故居，赵树理 1906 年 9 月 24 日出生于此宅。

宁郡，后齐废郡改为永宁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为沁水县，唐宋金元俱属泽州，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属泽州府，民国迄今县名仍之。

沁水县城位于县境西部偏南，出县城向东行45公里，便是端氏镇。从这里沿沁河南下，行17.5公里，可以见到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尉迟村。尉迟村原名吕窑，村里建有一座“尉迟庙”，是村民为了纪念唐朝开国功臣尉迟恭（又名尉迟敬德）而建。相传为人正直的尉迟恭（李世民做了皇帝后被封为“鄂国公”）愤于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杀戮忠良，盛怒之下杀了赃官，潜逃出京，隐姓埋名，流落于此，并将编簸箕的手艺教给这里的村民。后来尉迟恭返回故里朔县，人们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为了纪念他，遂将村名改为“尉迟”。尉迟村是由沁河冲积而成的一块河川平地，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相传唐代即有手工缫丝、织绢、榨油等手工业；这里交通便利，人流密集，自古为著名的商贾要道，南来北往的商人们都会在这里停留住宿。

1906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初七），尉迟村农民赵和清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乳名“得意”。他们家曾生过几胎，都是女孩，只活下一个。祖父母早就盼着生个男孩，这个男孩的诞生，当然使两位老人感到分外“得意”。到孩子五六岁开始读书时，起官名“树礼”，字“齐明”，又作“齐民”。1930年从国民党“山西省自新院”出来后，改名为“树理”。据说，他改名是要“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

赵家原居尉迟村对岸的武安村，后迁居于尉迟村。原修有“棋盘四院”，后只剩东院、西院^①。赵树理即生于西院，据说为“清太学生赵钟恩”之七代孙。赵家当时有七口人，16亩地。

赵钟恩之弟赵钟勋，是东院的主人，清朝的武举人，官至五品。说明赵树理的远祖在清乾隆年间是有一定功名地位的人，只是从赵树理的祖父开始，家道才逐渐中落，遂成为普通农民家庭。

祖父赵中正，小名东方，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元1847年1月1日），有文化，好读医卜星象的书。早年在河南省归德府（今商丘市）经商，30多岁后，弃商回家，买薄地务农，开过私塾，曾与续弦的妻子一同加入“三教圣道会”（原“三华堂”一支）。所谓“三教”，指儒教，佛教，道教。这个会将三教合而为一，宣传“儒重忠恕，释重慈悲，道重感应”，常用大幅布幕画上“二十四孝”、“九幽十八层地狱”故事，挂于集会，进行宣传。

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小名双全，生于1884年8月4日（清光绪十年六月十四日），迷信鬼神，会算卦，外号“小孔明”；除种地外，兼编簸箕，喂蚕养蜂，粗通医道，人称“万宝全”。母亲王金莲，生于1885年9月8日（清光绪

^① 东院大门现存木匾一块，刻有“天水望族”四字，落款乾隆乙酉年。赵家祖上当由甘肃迁来。



■

赵树理母亲王金莲

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入“清茶教”，吃素。据赵树理的三妹赵玉琴^①讲：“父亲和爷爷不同，是个农业生产的多面手，也是家里唯一的劳力。他扶犁耕地、摇耒下种，样样拿得起；拉锯、修工具、打铁、做木活、补锅，样样都会干。他还念过易卜星象之类的书，能诊脉开方，外科更行；还会看风水、测字，喜好凑热闹、闹红火，是我村‘八音会’的一名拉弦能手。那时间，父亲在村里称得上‘文武双全’，又有‘小孔明’外号。他对我哥哥写《小二黑结婚》里塑造‘二诸葛’的人物形象有一定作用（这里主要是指有关观象、测字算命方面生活的熟悉情况，实际上我父亲根本不以此为业，遇事也根本不像书中‘二诸葛’那样迷信书本，而很讲究实际）。我的母亲王金莲，是一位端庄、贤惠、精明能干的农村妇女。她勤俭朴素，平易近人，出色地操持料理着家务，是个善于忍受活的人。”^②

① 据赵二湖（赵树理之二子）讲，赵玉琴称三娃，故应为三妹。

② 赵玉琴：《回忆我的哥哥赵树理》，载《赵树理研究》1989年第2期（总第6期）。

据赵树理讲，他们家是一个有宗教关系的下降的中农兼手工业者的家庭。他的爷爷和父亲为人诚实，除种地外，农闲时还动手编织柳条家具，如簸箕、柳篮、柳筐及针线筐箩、笊篱等，这些编织物都卖给邻村村民，所得零钱用以补贴家用。赵树理从小跟着父亲学医、识字，十分认真，在编织技术上比他父亲有所改进。赵树理参加革命后编过报纸和刊物，因此，他戏称自己家算是“编辑世家”。

赵树理的启蒙教育是由祖父承担的。从6岁开始，由祖父教他念《三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不让他和其他孩子玩，并且要他身体力行能为他所理解的那些道德准则，例如拜佛、敬惜字纸、走路不左顾右盼、见人要作揖、吃素等。祖父晚年，强调积福行善，不做亏心事，赵树理也都认真践行。小时候，他把做的好事坏事都记录下来，开始是划杠杠，做了好事划竖杠，做了坏事划横杠；后来改成放豆子，做了好事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所谓好事，如修桥补路、掩埋尸骨等，坏事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即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赵树理对这些信条都忠实地履行，在他的罐子里，总是白豆多于黑豆。这些，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他的诚实做人、不说假话的品德和是非分明、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基本养成。

祖父所施行的严格的传统教育极大地束缚了赵树理的儿童天性。由于祖父将赵树理圈在四合院，平常不准出门，赵树理对墙外的事物很少了解。这使童年的赵树理变得孤独、拘谨。同时也影响了身体发育，八九岁了还是很瘦弱，并且经常闹病。

在赵树理10岁时，祖父去世。为给祖母治病和举行葬仪，家中积蓄消耗殆尽，一家生活甚感困难。父亲把他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

私塾馆设在赵家东院西北堂屋的两间厅房里，屋内设有讲台，仅有一张八仙桌，几条板凳。约有20个学生。先生是位老秀才，名叫赵遇奇，郭南村人，60多岁，中上等个儿，长方脸，瘦瘦的，面色青黄，表情严肃，学生见了他就怕。早晨，他坐在桌边，领着学生念《四书》（称“号书”），号完书回家吃早饭，饭后回来背诵昨天教的书。这以后，几乎再不见这位先生的面，因他躲进隔壁东房抽大烟去了。

东院虽然不大，环境还算清幽。“院中放着几口花缸，里面栽着四季常青的柳叶桃，四五月里，粉红色的花朵开满枝头，砖垒的花池子里种着各种花草，争芳斗艳，石榴树、海石榴的花色金黄，蓬勃向上，红火热烈。天冷了，各家的花都移到屋子里，外面冰天雪地，屋内十月阳春，书声朗朗。赵树理那时很少讲话，身穿蓝土布长袍，与其他孩子一样，剃光头不留发辫，身体比较文弱。但他聪明好学，《四书》之类背得滚瓜烂熟。”^①圈在自家四合院过了十年的赵

① 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树理，第一次和村里的孩子们相接触。在这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里，那些孩子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欺生。他们常常联合起来欺侮他。据赵树理回忆：“因为自己家庭寒酸，无力给大同学进贡（送吃零食），大同学集体来对付我，我的忍辱生活就开始了，他们要我当差，哪一次不从他们的要求，他们便集体到先生面前告状，说我坏话，使我挨无故的打骂。开始也曾反抗过几次，但先生因此反认为我是最顽皮的学生，一和别人发生纠纷，处罚总是无例外地落在我头上。”^①好在这种生活只持续了一年。但赵树理觉得一刻也不能再延长，来年便在父亲面前表示誓死不再入私塾，父亲怕他真的寻死，就不再坚持，母亲是早就被他说服了的，也帮他说话。这样，赵树理离开了使他备受屈辱的私塾。

二、崇拜“江神童”

离开私塾后，赵树理回家当了一个“小农民”，跟着父亲学种地。放牛、拾粪、担炭，无所不干，生活虽然仍很艰辛，但使赵树理感到欣慰的是，他能与很多读不起书的农民的孩子相接触，而且一改先前被侮辱被伤害的境况，与穷孩子们平等相处。在他后来写的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开头所写的七个穷孩子到离村二里远的三角坪放牛的情景，便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们每次把牛赶到坪上，有时是赶着毛驴，先要商量玩什么。往常玩的样数很多——掏野雀、放垒石、摘酸枣、捏泥人、抓子、跳鞋、成方……这一天，他们商量了一下，小伙伴小圉提出个新主意：说咱们唱戏吧！于是，七八个孩子便开始大演其戏。张仁义和栗守田在《赵树理同志与上党戏曲》一文中曾写过他们当时唱戏的情景：

“大约是1918年前一个春天吧。沙滩后边的一溜柳树，已经抽出了嫩芽，长长的柳条，点缀得大地生气盎然……（他们）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地头上插着‘雉尾’、腰中系着‘丝绦’（都是嫩柳条条），手执‘长枪、短剑’，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那个‘指挥官’（也可叫做‘导演’吧），大伙都叫他‘得意’，总有十二三岁，瘦瘦的脸上，镶着两只忽灵灵的大眼。他决定谁装张飞，谁演罗成，谁当牛皋，谁扮焦赞。让‘张飞’和‘罗成’开打，‘牛皋’和‘焦赞’拼杀，大家都‘冬仓冬仓’地用嘴念着锣鼓点，红火紧张，煞是有趣。直到玩了个尽兴，才各人赶上各人的毛驴，上煤窑去驮煤。今日如此，明日还是如此，除非是犁开了地，牲口不去驮煤，才不能搞这个‘张飞打罗成’的游戏。”

^① 董大中主编：《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这个叫“得意”的孩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少年时期爱学唱戏，爱看戏。他后来多次谈到他学唱上党戏的情景，他说：“罗成这个人，在广大群众中还是有些鼓舞作用的。我小时候就曾和我的朋友玩耍过‘张飞’战‘罗成’。”^①在《与青年谈文学》中写道：“我是农民家庭出身，住在山区，我小孩时，常赶驴子驮煤，晚上看了罗成戏，在路上和小同伴们玩，就当起罗成来了。”^②他对人说他小时候常到湘峪看戏。湘峪在沁河东岸，隔着一道乱石槽，离尉迟村有十五六里。只要有戏，无论是月朗还是月黑，他天天都去，有时一连三天三夜，场场不误，三趟来回一百多里，不嫌累，因为他太喜爱戏剧。

赵树理8岁时已经学会打上党戏的梆子，15岁学会打上党戏的鼓板。鼓板是指挥其他乐器的，要掌握全剧的缓急节奏，因而往往要把唱词、道白等全部背下来，他是能背诵一些的，直到晚年也不忘。在赵树理一生中，地方戏曲与他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在创作上受地方戏曲的影响也非常明显，这与童年时代这段经历很有关系。

在祖父去世后的三年半中，赵树理在接触农村文化娱乐过程中，学了一些地方音乐和书词、戏本。他除了和小伙伴们玩演戏，还常常去本院东侧近邻赵洪举老汉的瘫痪儿子赵接成那里借书看，什么《西厢记》、《聊斋志异》、《施公案》、《包公案》、《七侠五义》、《刘公案》等等，他都借阅过。除了像《西厢记》、《聊斋志异》有较高文学价值外，其他侠义、公案小说虽然文学价值不高，但这些小说的阅读，对赵树理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还是有一定帮助。

这一时期，他们还到“东头院”去玩。那里住着吕家四兄弟。吕家四兄弟除老四有妻室外，三个哥哥都没有成过婚。这家兄弟家境虽然穷苦，但都爱好民间音乐，家里存有整套八音会乐器，这是供村里逢年过节闹红火和村里红白喜事吹打用的，吕家兄弟自然精通这些乐器。赵树理不仅向吕家兄弟学会了打上党戏的梆子、鼓板，还听到了许多历史故事、“异乡珍闻”。

南院住着一位光棍汉张存财，他爱说、爱唱、好编个顺口溜，会唱农村小调、山歌一类。村里有什么事，存财就编个顺口溜宣扬一番。他会打鼓乐家伙，饭前饭后，常用碗筷敲打，唱上一通，他对赵树理影响很深。赵树理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民间文艺的氛围中成长的。

三年的“小农民”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但从小参加农业劳动，使赵树理养成了劳动者的身手和习惯，也增强了他的生活本领，并一生以劳动为乐事。

① 赵树理：《若干问题的解答——写戏改戏的标准》，见《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98页。

② 赵树理：《与青年谈文学——在旅大市文学爱好者会上的讲话》，见《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26页。

赵树理生于清代末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当时的中国早已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就在赵树理出生的前一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同年7月，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各地开始兴办学校。地处山区的尉迟村，文化还很落后，赵树理小时候念的仍然是私塾，读的仍是孔子的书。直到1919年的夏天（这时刚刚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赵树理才到了位于榭山寺的县立第二高小读书，编在补习班。他的父亲原本没有打算让赵树理长大离开农业，但在他14岁那年（即1919年），他的父亲被村里一个退職的小军官说动，才让他上了高级小学。这位邻居费了很多唇舌，不过谈话的中心只有一个——“出路”。他无非说，“在家种地没出路”，“念书人腿长，说上去就上去了”（指当官），“为了孩子的出路，应该花点本钱”等等。

尉迟村与赵树理一同入学的还有三个孩子，家庭都比较富裕。别人家的孩子穿着新衣服，被褥都是缎面的，赵树理不仅没有什么新衣，被褥也是用买来的两件旧神袍改做的；别人家为孩子送行吃猪肉拉面，赵树理家吃的是小米干饭；那三个孩子有的骑马、有的坐车，赵树理是自己挑着行李，跟在人家后边去的。

赵树理到校后，功课很好。他好学，记忆力强，善于思考，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一次算学测试中得了个第一名，学校还奖给他一块银元。

1920年春天，赵树理正式编入高小一年级第五班。据比赵树理小8岁，也上过榭山高小的张孝骞回忆说：“赵树理是榭山高小五班的学生，我是11班的学生，1926年才入学。校长叫韩凤鸣，沁水城关人，我在学校读书时，师生中传说赵树理很特殊，家里很穷，每逢年头月尽，他父亲便一路编簸箕，走上个三四天赚点钱送给他。他平时随便，（好像）不很用功，课堂下来好拿铅笔打锣鼓点，唱歌能倒着唱下来。可是大小考试总是名列前茅，班级排榜总是第一名。”

地处山区的沁水县很闭塞。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科学与民主的风还没能吹到这里。榭山高小名义上是一所新式学校，并且开了算学、社会等“新学”方面的课程，也开始学习白话文，如胡适、蔡元培等人的文章，而在实际上，它所教的，主要还是“四书”、“五经”等“经学”，写作方面的题目多是“学而时习之”、“不违农时”或“今是最宝贵的”一类，教育学生爱惜光阴，不荒废学业。

1922年，赵树理刚满17岁。这一年旧历腊月二十六日（公历1月23日）同马素英结婚。马素英是阳城牛家岭人，比赵树理大四个月，其父崇信“太阳教”。该教一年四季大敬神。与马素英结婚不久，两人便一同加入了“太阳教”。

在榭山高小，赵树理还领导学生举行过罢课。据豆积孝回忆：“虽受封建、

资产阶级的教育，但由于他读书广，思想开阔，加之他从小参加农业劳动，养成了勤劳习惯，平时关心政治，留心时事，学生时代就初步具有爱国、反封、反帝的进步思想。如在榭山高小，赵树理带头签名罢课的事情，巧妙地使同学们在碗圈周围签名，使人看不出前后次序。校长王益召开教员大会，追查谁是头头时，虽然把赵树理和一些学生关了起来，但并未查出谁是头头，结果无法处理了事。”^①

1922年，赵树理高小即将毕业，他买到了一本江希张著的《四书白话解》。当时传说该书的著者江希张是个“神童”，实际上是一位老道学先生写的，只是用了他孙子的名义出版。此书是封建顽固派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主张复古，以对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阎锡山曾为之题签作序吹捧。赵树理买到后，甚为喜爱，连续数年，恭读不辍。

爱屋及乌，赵树理不但服膺书的内容，而且对该书假托的作者“江神童”至为崇拜。据他说：“该书思想是儒佛相混的。这恰好合乎我从祖父那里接受来的那一套，于是视为神圣之言，每日早起，我都向着书面上的小孩子照片稽首为礼，然后便正襟危坐读了起来，并且照着他在《大学》一书中的指示来反省自己。我从高小毕业后，又教了二年初级小学（那时候高小毕业可以教初小），连同毕业之前的一年共三年，对这部书的礼读没有间断过。”^②

这就是赵树理在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赵树理在1956年回忆说：“总之，在这阶段，我以学习圣贤仙佛、维持纲常伦理为务，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人看来，以为是好孩子，可惜‘明书不明事理’。”^③

三、参加共产党

赵树理高小毕业后，分别在野鹿村和板掌村各教了一年书，另外在西冯村还教了几个月私塾。在这段时间里，尽管赵树理恪守传统道德，本分做人，热爱学生，认真从教，并经常帮助村民写写画画，人缘还算不错。但赵树理处事不够通达，认死理。1925年前半年在阳城县西冯村教私塾时，为村中士绅所不容，于是辞掉教职，回到家里。

1925年2月，赵树理的长子太湖出生，取名广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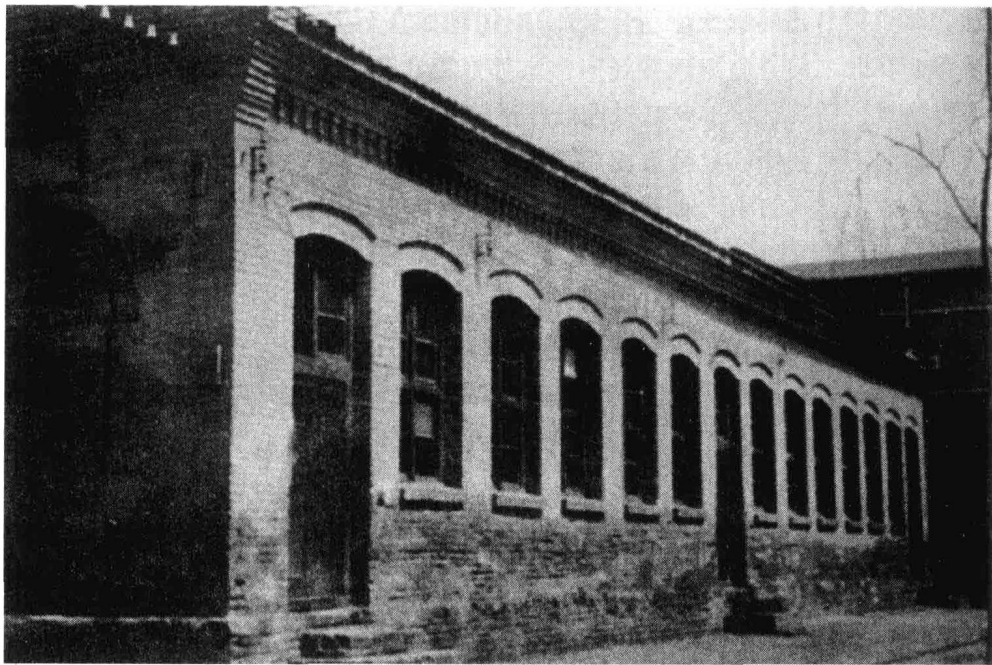
同年8月，赵树理考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校址在长治第一中学）初级部，编在第19班。当时他考试成绩时名列第四。

在赵树理入校前后，山西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24年春，高君宇受李大钊的指派回山西建党，成立了党小组。夏秋之交，中共太原支部正式建

① 豆积孝：《回忆赵树理同志》，载《沁水党史资料》（打印本）第1辑。

② 赵树理：《谈话摘录》，见《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③ 同上。



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5年夏至1928年春，赵树理作为第19班学生在这里上课、做文章，写《驱姚宣言》。

立。1925年“五卅惨案”后，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成立了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崔锄人、王鸿钧、周玉麟、王瀛等人组成。嗣后，周玉麟前来长治发展共产党地方组织。到1926年春在长治四中建立起党小组。

“当他一条扁担挑上简单的行李，来到城市读书的时候，他血管里奔流的仍然是从那块沃土里（按：指地处太行山的家乡尉迟村）吸取的养料。”^①到长治四师后，他仍然遵守着祖父教给他的那些宗教道德格言，仍然继续礼读江希张的《四书白话解》。但很快，与第15班同学王春的相识，使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并开始接受新思想。

王春是阳城县四侯村人，1951年12月30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年仅44岁。王春生前任《工人日报》社社长，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那时赵树理任工人出版社社长，但只挂个名，不管社务，王春病故后，赵树理也不再是社长了。据赵树理自述，王春“比我小两岁，但比我高两年级。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当时迷信，不吃肉，敬惜字纸，把带字的纸收起，烧成灰，撒到河中。王春开始奚落我，我和他辩论，每次都输，输了才接近他”。^②王春向赵树

① 王中青：《太行人民的儿子》，载《山西日报》1978年10月15日。

② 赵树理：《运用传统形式与现代戏的几点体会》，见《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88页。

理介绍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赵树理如获至宝，立即向同班同学常文郁推荐。在此之前，赵树理曾经向常文郁推荐江希张的《四书白话解》，常文郁不以为然，而常文郁也向赵树理推荐过韩愈，赵树理也不以为然，因为赵树理认为韩愈未能在明心见性方面用功夫。用赵树理的话说，两人都是迂腐之徒，均为地方上迂腐的小学所害。这回，崇拜韩愈文章气势的常文郁见到梁启超的文章，非常佩服，于是，两人成了至交。赵树理自己说，常文郁“有独立性”，自从随王春找到读书的门径之后，便自行找着书读，而赵树理，每读一书，都要由王春推荐。他那时读得较多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著作或翻译作品。他自己不作鉴别，只要是王春介绍的，他一定找来读。在他的眼里，王春是先生。“王先生”，这便是赵树理对王春的敬称。

王春对赵树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王春的启发、帮助下，原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彻底动摇，是王春打垮了他的“江神童”思想。如前所说，这个时期他读的书很杂，同时可以接受互相矛盾的书——例如对科学与玄学的东西可以兼收并蓄，而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主要还是反礼教反玄学的那些思想。

从1926年初夏开始，赵树理开始较多地接触新文学。他爱读鲁迅、郭沫若、成仿吾、郑振铎等人的作品和《小说月报》、《文学周刊》等杂志。也就在这个时候，与史纪言、杨蕉圃等人的接触逐渐多起来，随即结为好友。据史纪言回忆说：“我和赵接触多有两个原因：一是都爱读新书；二是都喜欢民族音乐。当时，我们大量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报刊和五四新文艺，也看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经常翻阅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等。至于《胡适文存》、《独秀文存》、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等，则更是我们争相传阅的读物。”^①

这年暑期，赵树理回了一趟家。他带回去一本《生理卫生》，他父亲说这书可以不用念，意思是屁大一点病就“延医诊治”或“送医院”，农村人没有这样的习惯。同时，他还带了一些自己爱读的新小说、新杂志，想把他在四师接触新文学的感受传达给乡亲们，他以为包括父亲在内的村里人一定会像他一样地喜欢。结果与他的期望相反，大家都不爱听。他发现，大家不爱听的原因是因为他说话时所带的“学生腔”在作怪。他从碰壁中得到了教训，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间长了就变成了习惯。这无疑是重要的，它促使赵树理在后来长期的生活和写作生涯中，注意改造“学生腔”和“欧化语法”，努力运用农民群众的语言进行写作，从而成就了一位杰出的大众化作家，一位语言大师。

^① 李士德：《赵树理回忆录》，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左图为王春，右图为常文郁。

1926年的秋天，赵树理认识了王中青，从此，两人的友谊一直保持下来，直到赵树理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王中青是长治捉马村人，当时名“忠卿”，别号荅臣，1926年夏天考入长治四师，编在第21班。王中青说：“我是在1926年认识赵树理的。那时，我们都在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按：校址在长治城内南街）。他比我高几个年级。初认识他时，感到这个人平易近人，说话幽默，富有风趣，是个很容易获得别人赞佩的人，他宿舍桌子上、床头上都散放着许多书，铺盖行李很简单，睡觉时把被子一摊开就睡了，起床后把被子往墙根一推，又把书摆开了。他好读书，创造社、新月社的作品以及经、史、子、集他都读。所以，他也是一个博学的人。”^①1926年，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暑假以后，国民党长治市党部成立，常文郁首先加入了国民党，接着介绍王春、赵树理等十余人参加。

1927年初，常文郁联络了一些革命同志，以研究学术为名，成立“晋山研究社”，之后又成立了农民讲习所，很快发展到九十多人。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农民协会，以常文郁、常子善、常行先为首，领导农民开展反封建主义的斗争。1月中旬，学校放假，赵树理随常文郁到晋城西南的东常、冶底、犁川等村庄，

^① 王中青：《我的挚友赵树理》，载《山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从事革命的宣传活动，大约有十天的时间。

有一天，常文郁送给赵树理一本《共产主义 ABC》，让他悄悄地读，并告诉他自已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并要求赵树理不要对任何人说。

在这一年的4月，由常文郁、王春介绍，赵树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赵树理入党后，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在长治街头演讲、游行、写标语、画漫画。同时他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秘密发展党员。他选择了史纪言、王中青、杨蕉圃、郜鼎邱、霍启高等五人为培养对象，并介绍《东方杂志》的列宁专号等公开刊物让他们看，并对他们进行“人格教育”。最后，他把霍启高介绍入党。霍启高是下一年级的学生，沁水县东乡人。

9月至10月之间，赵树理参加了组织四师全体学生驱逐校长姚用中的学潮。起因是学校体育会算账时，发现王承（国民党员，四师体育会负责人）有贪污现象，同学们要求将他开除，而校方有意庇护，但因证据确凿，无法辩解，遂用投票方式解决，校方以为反对王承的只是少数人，结果绝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进步学生取得了胜利。

王承被开除后，校方暗地进行调查，准备镇压学生，有人借机陷害与自己有隙的同学，闹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进步学生遂酝酿发动学潮，要将校长姚用中驱逐出校。

赵树理是这次驱姚学潮的策划者、领导者之一，也是《驱姚宣言》的执笔者之一。

姚用中担任四师校长期间，劣迹很多，学生意见很大，这次驱姚运动持续了一个月。1927年11月22日，新校长范郁如到任。在22日的欢迎会上，赵树理继新校长讲话和王春演讲后，也发表了讲话，指出新校长“给我们带来三种幸福”，希望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新校长能“开上党文化之先河”。先后还有几个同学讲话。

到此，“驱姚运动”取得了胜利。

四、初登讲台

1928年春，阎锡山与蒋介石合流反共，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先是第15班一个姓杨的同学被捕，接着刘光第被捕，二人均为共产党员（后杨叛变），同时传出常文郁被捕的消息。于是，同住一室的赵树理、王春、赵克宏、霍启高等四人（均是共产党员）商量对策。王春提出逃亡，其他三人认为，王春易为人所疑，应该出去避一避，他们则无此必要。他们称王为“先生”，特别是赵树理，自认识王以来，奉王为偶像，对王言听计从。经王说服，他们同意一起逃亡，赵树理还幽默地称自己像是唐·吉诃德的仆从桑·潘扎。